

避暑山莊博物館

文 集

——紀念建館五十周年



COLLECTED WORKS OF THE IMPERIAL
MOUNTAIN RESORT MUSEUM

避暑山庄博物馆文集

——纪念建馆五十周年

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 编

《避暑山庄博物馆文集》编委会

主 编：张占生

副 主 编：周晓梅 刘爱东 孙继新

封面设计：董建力

封面题字：启 功

序

199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澳门回归祖国怀抱，是双喜临门的喜庆日子，我们满怀喜悦的激情，又迎来了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

避暑山庄博物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是我国著名的清朝宫廷历史三大博物馆之一。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避暑山庄，即避暑山庄博物馆的所在地，是清王朝的又一个政治中心，同时又是清前期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有清一代重大的政治、军事、民族、宗教、文化及外事等活动，大多在避暑山庄举行，可以说避暑山庄和清王朝的兴盛和衰亡紧密相关，是研究清朝历史的科研基地。

避暑山庄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闻名于世，馆藏文物以清宫廷御用珍宝为主，计有各类宫廷艺术品三万余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500家博物馆之一。

五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避暑山庄博物馆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和精神文明的窗口。

建馆以来，共举办的各类专题展览近百个，利用文物优势，我馆还采取走出去，举办国内、国外巡展，先后在十几个省、四十多个大中城市巡回展出，并与兄弟馆在国外举办专题展览，并且利用宫廷古建筑举办的复原陈列，成为避暑山庄的象征，吸引了国内外上千万的观众，也是国外贵宾和国家领导人必到之处，为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对外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避暑山庄博物馆文博业务人员，几十年如一日，以高度的责任感，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在工作实践中

进行研究和探索，特别是对清朝的历史、民族、宗教、典章、制度、古建、园林及各类文物潜心钻研，撰写了大量文章，而且有不少优秀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取得了可喜成绩。

在建馆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汇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馆业务人员，在不同学术领域取得的业务成果，并择选其中部分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汇集成篇，做为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一项内容。

它既是一部科学研究论文集，又是近二十年来业务工作的总结，虽然尚存在很多不足，但这也是我馆文博业务人员心血的结晶，它反映了我们对文博事业的热爱和追求，在此基础上，我深信未来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馆长 张占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

目 录

清帝“省方驻蹕”的重要活动场所

- 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 杜 江 (1)
-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在热河 杨天在 (10)
- 清前中期皇帝典学述论 刘玉文 (19)
- 简述中英避暑山庄礼仪之争 张占生 (30)
- 康熙、乾隆二帝在避暑山庄对我国天文大地的测
绘学的贡献 冯春江 (44)
- 六世班禅朝觐乾隆事略 杜 江 (53)
- 雍正研究摭零 刘玉文 (65)
- 试论清代满汉文化的民族融合 周晓梅 (78)
- 乾隆皇帝的接见与宴赏 杨天在 孙继新 (89)
- 乾隆帝的四十个万寿节 刘建中 (101)
- 轰动朝野的嘉庆遗诏案 周晓梅 (108)
- 清代冠服制度的定制和特点 陈玉霞 (114)
- 乌兰布通古战场考 杨淑芹 (121)
- 清帝驻蹕热河期间的邮驿 姜 月 (124)
- 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简析 杨天在 (130)
- 避暑山庄四知书屋建筑功能探微 周晓梅 (145)
- 历史的见证 艺术之宝库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巡礼 张占生 (151)
- 康乾盛世时期避暑山庄七十二景的绘制 冯春江 (154)
- 《热河千尺雪》图卷与“千尺雪” 刘爱东 (165)
- 从避暑山庄三大殿的陈设看清代帝王对吉祥图案
的使用 孙继新 (169)
- 珍贵的文津阁缂丝挂屏 陈玉霞 (177)
- 永谥与《文津阁缂丝挂屏》 彭俊波 (180)

清圣祖的《御制避暑山庄记》	刘 玮 (183)
避暑山庄博物馆馆藏玻璃器概述	周立平 (190)
从避暑山庄的三块诗匾看乾隆皇帝的晚年心绪	孙继新 (194)
康熙躬亲农事	刘春云 (198)
《木兰秋狝图》与清帝狩猎活动	杜红雨 (202)
万树园黄幄与火戏	杜红雨 (208)
避暑山庄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尺	彭俊波 (212)
避暑山庄博物馆馆藏乾隆瓷碗	彭俊波 (216)
避暑山庄“清音阁”与“一片云”戏楼	陈玉霞 (221)
乾隆色地粉彩轿瓶赏析	彭俊波 (226)
“十六应真”挂屏	刘春云 (233)
避暑山庄文物趣谈	孙继新 刘爱东 (237)
浅议外八庙的佛塔	孙继新 (241)
漫话外八庙琉璃的使用	李素华 (245)
唐英与避暑山庄瓷轿瓶	刘春云 (251)
关于举办精品展的几点体会	张占生 (255)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博物馆的生存与发展	孙殿富 (263)
试论博物馆陈列语言	周晓梅 (273)
立足自身、推出精品、服务社会	娄 月 (280)
浅谈避暑山庄博物馆第一个精品陈列 ——《清宫佛教艺术珍品展》	杨余庆 (285)
瓷器、珐琅展览形式设计探微	董建力 (290)
避暑山庄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做法	陈玉霞 (294)
丝织品类文物保管工作浅谈	陈玉霞 (300)
防止陶器自然损害小议	郭承河 (305)
避暑山庄的两次重大文物捐赠及文物	刘 玮 (309)

清帝“省方驻蹕”的重要活动场所

——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

杜 江

清代，承德雄踞塞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承德成为皇家狩猎场和紫禁城外清帝的夏宫，同时，也成了清帝“省方驻蹕”^[1]的重要活动场所。清帝在此，除了射猎、清暑纳凉以外，民族活动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在众多的民族活动中，清帝在承德与蒙古诸部的接触，又显得尤为突出，清帝通过木兰围班和山庄朝觐、封赏、推行喇嘛教等办法，增进民族情感，加强对草原民族的管理，以巩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

清帝巡幸塞外，接见蒙古王公，已成为他们治政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帝“省方驻蹕”以康熙、乾隆帝为例，通过召见，反映不同时期清帝治理民族事务的侧重点、演变和发展。

清帝玄烨自康熙十六年（1677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出塞巡幸五十四次，其中，有十二年每年出塞两次，清帝弘历自乾隆六年（1741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再加三年太上皇，共赴山庄五十二次。康熙、乾隆两帝出塞赴山庄，由于时代的不同，所以，在接见蒙古诸部王公也有所区别，康熙朝多侧重漠南和漠北蒙古，乾隆朝在巩固和发展康熙朝的基础上，重点则放在漠西厄鲁特蒙古。这也是清王朝对蒙古政策的总趋势，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这段历史史实。

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为例：这一年的六月初启巡幸塞外，到十月十六日回到北京，其间，康熙“自喀喇河屯启行巡

视诸蒙古，赐来朝科尔沁、郭尔罗斯、都尔伯特、扎赉特、翁牛特、巴林、土默特、敖汉、阿鲁科尔沁、乌珠穆沁、浩奇特、阿巴葛、阿巴哈纳尔、苏泥特、四子部落、乌喇特、鄂尔多斯、喀尔喀诸王、贝勒、贝子、公、额附、台吉等衣缎有差”。^[2]

以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例：乾隆于五月二十一日自北京启程，二十七日到达避暑山庄，九月二十日回到北京。其间，七月十七日接见回部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子色提布阿尔第，杜尔伯特亲王策凌乌巴什，土尔扈特贝子沙拉扣肯，喀什喀尔伯克爱达尔之子乌鲁克等人。七月十八日木坪宣尉司坚木参囊康及各土司土舍头目等。二十一日接见西藏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二十五日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札布、土尔扈特郡王舍楞等入觐。二十六日，乌梁海散秩大臣依素特等入觐。八月十一日，土尔扈特汗策凌那木札尔等入觐。^[3]

清王朝对蒙古诸部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清朝统治者自身是少数民族，曾受过明王朝的民族歧视，由于地理上接近蒙古部落，对于蒙古民族的态度，其民族心理、习俗、信仰，以及蒙古潜在力的体会，理解得最深刻，所以，清朝对蒙政策的信条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4]，才能使蒙古成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的可靠同盟军。

如何联合和治理蒙古，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清王朝与蒙古的关系不同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也不同于北宋与契丹的“城下之盟”，如果采取明朝修长城的办法，想用一条军事上的防御工事做为分界线，扼守蒙古南侵，结果徒劳无益。明朝时，蒙古瓦剌部打到北京德胜门，清初，皇太极突破长城直袭山东兖州等地，都说明，只靠一条军事设施，来解决中央王朝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不会得到圆满结果。清帝认为：“岂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耶，抑果疏冗禅通所筑也，然则始皇之见亦愚矣”。^[5]所以，清王朝主张，“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而较长城更为坚固”^[6]的方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整套管理措施。

清王朝入关以前，崇德元年（1636年）就设立了“蒙古衙

门”，专门管理蒙古事务。崇德三年，随着民族事务的增加，设置“理藩院”，理藩院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办理蒙、藏、维等少数民族事务，依照《理藩院则例》行使职权，“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罚”。首先，对蒙古施行内属蒙古总管制和外藩蒙古盟旗制的分治管理。内属蒙古包括归化、土默特、察哈尔、准噶尔、呼伦贝尔等部，把他们编为“游牧八旗”，再加上乌梁海部，清政府派封疆大吏直接管辖。外藩蒙古则采取扎萨克的方式分封，是在原有兀鲁思（大领主）、土绵（万户）、鄂托克（小领地）等旧的区分基础上，建立盟旗。在漠南蒙古设立六盟四十九旗；在漠北蒙古设立四盟八十二旗；在漠西蒙古设立八盟三十二旗；在青海蒙古设立二十九旗。同时，对于有功于清王朝的蒙古封建主，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镇国公、辅国公六爵位，他们和执政的台吉、塔布囊都有奉禄，担任扎萨克（旗长）官职的封建主叫执政王公、台吉、塔布囊，其余叫闲散王公、台吉、塔布囊。不论执政还是闲散，其领主身份和爵位都是世袭。这样，使蒙古的上层首领得到了满族王公贵族相同的地位，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获得极大的满足。满王朝对蒙古采取“北不段亲”的政策，使满族王公贵族和蒙古上层首领，保持着婚姻关系，以“姻好”巩固政治上的“盟好”。清王朝还以推行喇嘛教的办法，使蒙古人“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7]此外，巡幸、秋猕、年班、围班、朝觐等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的联系和管理。

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为清王朝治理蒙古事务的重要场所，则突出了围班、秋猕和朝觐等项措施。木兰秋猕围班和避暑山庄朝觐，按时间的顺序，首先，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建立了木兰围场，确定了围班，而后，随着对蒙政策的发展和民族事务的增多，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产生了热河行宫，直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已初具规模，康熙才亲题“避暑山庄”。然而，围班的产生，又是年班制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年班朝觐是清初时居住在我国过远地区民族首领例行朝见皇帝的一种制度。从顺治年间开始，已成定制。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议准,年班朝觐的喀尔喀扎萨克,如果与内扎萨克一样,实行两班朝觐皇帝,由于路途遥远,不能体现关怀,所以,“应将喀尔喀扎萨克分为四班”,这样情况与喀尔喀相似的“厄鲁特及驻额济内之土尔扈特”青海蒙古也可以分四班。同时,规定了每班的品位和人数。如一班规定:喀尔喀蒙古四部中扎萨克图汗及部内贝勒一人、辅国公一人、一等台吉三人,土谢图汗部内亲王一人、辅国公三人、一等台吉二人,车臣汗部内贝子、辅国公各一人、一等台吉二人,赛音诺颜汗部内亲王品级郡王世子、辅国公、一等台吉各一人,此班还包括土尔扈特贝勒一人,乌兰乌苏厄鲁特贝子一人,贺兰山厄鲁特镇国公一人,推河厄鲁特公品级台吉一人。此外,还规定了喇嘛、回部、四川土司的年班。年班朝觐者,“均令按年于十二月封印前到京,其未及岁之扎萨克,不必来朝,各令台吉一人代觐”。但是,对于“无事故,托辞不期者,事发将该管扎萨克等一并题参治罪”。^[8]可是,蒙古诸部王公地处边远高寒地区“未经出痘者甚多,京城气候与边塞不同,伊等到此,即伤一仆从,朕心亦为不忍,著将伊等及所部详悉询明,曾否出痘……不可忽略”。^[9]为了更好地联系和管理蒙古诸部,使他们不间断地觐见“圣颜”,又要消除他们出痘身亡,以“进塞为惧”的恐惧心理,所以,康熙决定选择气候清爽宜人,地理条件适中的承德,修建行宫和木兰围场。

康熙认为,承德“北界兴安,东及辽水,山川形势之雄,甲于边塞”。这个具有军事地理位置的承德,正是“控制蒙古诸部落,内以拱卫神京”^[10]的地方。而木兰围场又具备了“灵囿成自天”优越环境,它“北峙兴安大岭,万灵萃集,高接上穹,群山分干,众壑朝宗,物产富饶,牲畜蕃育”^[11]。是清帝实施秋狝习武,推行围班的理想之地。至于避暑山庄的自然条件,可谓“群峰回合,清流萦绕”,具备了“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康熙巡幸此地,认为这里“辟为离宫,无侵民田庐之害,又去京师至近,章奏朝发夕至,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12]

实施围班的木兰围场占地广阔,周长六百五十公里,是在漠

南蒙古喀喇沁、翁牛特旗诸部“敬献牧场，肇开灵囿，岁行秋猕”^[13]的名义下创建。清帝认为，“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猕最盛”。^[14]通过围猎，可以“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15]，使那些宗室及贵族子弟不“堕入颓靡奢侈的生活”^[16]，以此达到加强武备，提高士气的作用。通过围班的形式，使随围的蒙古王公知威知恩。他们从围班中看到，木兰秋猕活动如同战场，声势浩大的狩猎酷似军事演习，一种威慑力量，给观围的蒙古王公留下深刻的记忆。同时，蒙古王公按围班的规定也要参加围猎，并根据猎获的多少，分别得到赏赐。在围班的活动中，还要举行蒙古民族所喜爱的诈马（骑生驹）、什榜（音乐歌舞）、相扑（摔跤）、教跳（套马）等文娱体育活动，当时，“从猎蒙古王公、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又喀尔喀四部及四卫拉特，并青海等部落，各扎萨克不下百余骑，中外一家之盛，实史册所未见”^[17]。

避暑山庄是康熙至乾隆，用了八十九年的时间，完成的规模宏大的皇家园囿和寺庙群，是蒙古王公、民族首领，“每岁入朝，锡赉宴飧厥有常典”^[18]的场所。正因为如此，“山庄为秋猕巡莅之地，自西事肇始，即武功告成，诸部款关，远人纳赆，仰流鲜集咸萃兹土”^[19]。康乾时期，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许多重大的民族活动，都在山庄得到妥善处理。这些民族首领在山庄受到清帝的隆重接见，其中少数人还会得到皇帝的单独召见，恩准畅游御园、观戏、赐宴、观火戏等活动。在朝觐的活动中，根据蒙古王公和民族首领的贡献，以及对清王朝的态度，分别予以封爵和赏赐。修建大型寺庙，推行喇嘛教政策，也是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不论是木兰围班，还是避暑山庄朝觐，它们表现形式和推行的方法，都是交替进行的。

以乾隆朝为例，乾隆十九年（1754年），“驾幸热河，准噶尔（泛指厄鲁特）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等来朝”。杜尔伯特部三策凌的内附，为清中央政权解决准噶尔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乾隆于同年五月，在山庄的澹泊敬诚殿举行隆重的仪式，接见三策凌一行，并“诏封策凌为亲王、

策凌乌巴什为郡王、策凌孟克、塞卜腾为贝勒……”。次年又晋封策凌为特古恩库鲁克汗、策凌乌巴什为亲王、策凌孟克为郡王。乾隆在山庄如意洲的延薰山馆中设宴款待三策凌一行，并在万树园张幕“赐宴、观火戏”。^[20]山庄朝觐过后，随同乾隆赴木兰围场观围，同时，编入围班的行列。同年十一月，乾隆再次来到热河，接见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杜尔伯特台吉纳墨库等。乾隆以接见三策凌的礼遇规格封赏此一行人等，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班珠尔和纳墨库为郡王，并赐予冠服。厄鲁特首领纷纷内附，影响极大，所以，清军顺利地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割据势力。达瓦齐后来被解送北京，乾隆御紫禁城午门受俘，并特赦达瓦齐，还“封以亲王，赐宝禅寺街，择诚隐郡王孙女配之”。^[21]达瓦齐随同乾隆赴木兰围场，享受蒙古王公围班的待遇。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乾隆首先是在木兰围场依绵峪接见其首领渥巴锡一行。土尔扈特部虽然在明末清初之际游牧到伏尔加河草原，但是，百余年间深受沙俄剥削和欺凌，于1770年11月在渥巴锡等人的率领下，历尽艰辛，行程万余里，历时八个月，最后回到祖国的伊犁。清政府拨给衣物、米谷、牛羊、庐帐等物，将他们安置在伊犁河流域。乾隆重视土尔扈特部的回归，在木兰围场“行殿召见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赐茶，并赐冠服”，以蒙古王公的待遇观围，赐给鞍马、橐鞬等物，“赐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黄辔，舍楞、功格、默门图、沙喇扣肯紫辔”。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弼里克图郡王、功格为和硕图贝勒、默门图为济尔噶尔贝勒、沙喇扣肯为乌察拉尔图贝子等。那些未至承德的土尔扈特首领也受到封赏。

乾隆由木兰围场回到避暑山庄以后，在澹泊敬诚殿举行隆重仪式，接见渥巴锡一行。“赐渥巴锡等玉如意、洋表、鼻烟壶有差”。此外，在万树园设野宴，看百技，观火戏。并按照年班朝觐的规定，对渥巴锡一行“瞻其汽牵，给以衣帐，轮其长于山庄肆觐，奉循祖制，锡之封爵，宴赉有加，更为度地充居分驻其众，凡一

切事宜依策凌、策凌乌巴什等之例”^[22]。

承德作为清王朝推行围班和朝觐的场所以外，伴之而来的就是奉行宗教政策，把喇嘛教作为统治蒙古的思想工具。康熙乾隆在承德修建十二座大型寺庙，无非是阐扬黄教，“盖以绥靖荒服，柔怀远人”^[23]。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值康熙帝六十岁寿辰，蒙古诸部王公“奉行朝贺，不谋同辞具疏陈恳，愿建刹宇为朕祝厘”。康熙审时度世，加强内外蒙古的管理，孤立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喇布坦的割据势力，所以，决定修建第一座寺庙，溥仁寺。同时，也出于清帝“驻蹕清暑，岁以为常，而诸藩来觐，瞻礼亦便”^[24]的需要。

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建普宁寺，是与平定准噶尔问题有关。经过乾隆两次平准，延续康、雍、乾三朝的准噶尔问题，最后得到解决。当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分裂割据活动以后，归服于清政府的厄鲁特四部：“绰罗斯台吉葛尔藏多尔济、辉特台吉巴雅尔、和硕特台吉沙克多尔曼济来朝”。乾隆首先在木兰围场接见此一行人等，后又回到避暑山庄进行朝觐活动。乾隆遵照康熙安定喀尔喀蒙古的办法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先例，“式循旧章”，修建普宁寺于承德，因为“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普宁’，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普宁。”^[25]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修建“安远庙”，也是“因思山庄为秋搜肆觐之所，旧藩新附络绎鳞集”^[26]，所以，按照新疆伊犁河畔固尔札庙（金顶寺）的式样修建“安远庙”。此外，久居依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的达什达瓦部落迁居热河，希望有一座他们熟习和崇敬的寺庙，使他们有礼佛之处。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修建“普乐寺”，是因为蒙古诸部素信佛教，所以，采取“因其数，不易其俗”办法，修建普乐寺的宗旨是“且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杜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普乐寺旭光阁为喇嘛教修法的道场，是蒙古人非常崇拜的地方，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哈萨克和布鲁特首领来普乐寺只是让他们

“仰瞻”，或者说是参观，是不改变他们的信仰。皇帝是以普乐寺的宏伟建筑艺术，宣耀国威，使其广生肃然起敬之心，以达到“埤满所欲，无二心焉。”^[27]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小布达拉），全部工程用了四年的时间，占地二十二万平方公尺，是外八庙中最大的一处藏式寺庙建筑群。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是喇嘛教信奉者朝圣之地，所以，乾隆借用自己六旬庆典和次年皇太后八旬圣寿的时机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使“旧隶蒙古喀尔喀、青海王公台吉等，暨新附准部、回城众藩长连轸偕，胪欢祝嘏”的时候，既可有蒙古人向往顶礼膜拜之处，也可以显示清王朝的国力。此外，普陀宗乘之庙的碑文中还记述了久入俄罗斯之土尔扈特部，因“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近且征其子入质，而俄罗斯有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处”^[28]回归祖国到达伊犁。并赴承德木兰围场观围和避暑山庄朝觐乾隆皇帝。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以后，乾隆在庙内的“万法归一”殿中，为土尔扈特部落首领渥巴锡一行，举行了隆重的宗教欢迎仪式。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归，是清王朝对蒙政策最后一个高潮，至此，蒙古诸部得到有效的治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修建须弥福寿之庙（扎什伦布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从后藏来承德朝觐乾隆，并为其七旬寿辰庆贺。乾隆对于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安排。首先，“肖其所居，以资安禅”。乾隆回忆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进京，到六世班禅来承德朝觐，已有一百多年了，清初开创之始，如“喀尔喀、厄鲁特、尚有梗化者，今则重熙休和，喀尔喀久为世臣、厄鲁特亦无不归顺”，而此时，笃信喇嘛教的蒙古诸部，“一闻班禅额尔德尼之来，其欢欣舞蹈，欲执役供奉”。^[29]乾隆以六世班禅到来之机，采取“敬一人而千万悦”^[30]的办法，不惜重金修建须弥福寿之庙。仅寺庙中六世班禅讲经的“妙高庄严殿”和住宿楼“吉祥法喜殿”，两处镏金铜顶，就用黄金“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九两”。^[31]乾隆优渥班禅，一方面加强对西藏地方政权管理，另一方面，还是

为了蒙古诸部。

清帝利用承德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的特定环境,通过围猎、朝覲和宗教等办法,加强对蒙古诸部的管理,为稳定清王朝边圉的安宁,巩固封建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注释:

- [1]《承德府志》序。
- [2]《热河志》·巡典二。
- [3]《热河志》·巡典十。
- [4]《清高宗实录》卷二十。
- [5]昭槁《啸亭杂录》卷十,古长城。
- [6]《东华录》康熙三十年。
- [7]《清高宗实录》卷1427。
- [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一,柔远清吏司。
- [9]《热河志》徠远一。[10]同[1]。
- [11]嘉庆《崖口木兰记》碑文。
- [12]《御制避暑山庄诗》恭跋。
- [13]《热河志》围场一。
- [14]魏源《圣武记》国朝绥服蒙古记一。
- [15]《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
- [16]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
- [17]《热河志》围场三。
- [18]同[15]。[19]同[9]。[20]同[9]。
- [21]昭槁《啸亭杂录》西域用兵始末。
- [22]《热河志》徠远二。
- [23]承德《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碑文。
- [24]承德《溥仁寺碑文》。
- [25]承德《普宁寺碑文》。[26]同[23]。
- [27]承德《普乐寺碑文》。
- [28]承德《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
- [29]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碑文》。
- [30]同[22]御制诗句。
- [31]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总管内务府奏销档》356号。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在热河

杨 天 在

马戛尔尼使团于1792年9月底从英国启航，于1793年的8月初抵达中国的天津。中国方面派遣长芦盐政徵瑞、直隶总督梁肯堂到天津负责接待。由于天津海口水位低，使团近百人携带物品改换拨船后，英舰、英船及看船600余人仍返回浙江宁波湾泊。8月下旬马戛尔尼等抵达北京。此时乾隆皇帝正在热河避暑山庄。经反复请示、协商，将英使所带礼物中的天文地理大表等体量大、难于运送者及仆从、匠役等21人留京外，其余70多人在马戛尔尼率领下于9月2日启程前往热河。在热河避暑山庄参加了乾隆皇帝83岁万寿节庆典，于9月21日启程返回北京。在热河停留了13日。

马戛尔尼使团在热河的主要活动是拜谒乾隆皇帝、参加万寿节庆典、游览避暑山庄……

1. 下榻馆舍

1793年9月8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三日），英国使团在马戛尔尼率领下抵达热河。先是于9月7日（八月初二日）到达喀喇河屯行宫，住在该行宫配房内。次日早8时，自喀喇河屯行宫出发，中午到达广仁岭。至此，热河已经遥遥在望。除装载行李、什物的车子继续前行而外，马戛尔尼、斯当东及其随员等就地更衣、整肃队伍、排列仪仗而后行。前面由中国官兵百人骑马作为前导，继而为英使卫队组成的仪仗队，后面是使团仆役、乐工、随员，最后是马戛尔尼、斯当东和小斯当东乘坐的英国式军车。下午3时许，使团到达热河，住进馆舍。馆舍设在当年康熙舅舅佟